杨树达 撰

汉代婚丧礼俗考

王子今 导读

蓬莱阁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6.709
Y270/W
0037205

杨树达 撰

汉代婚丧礼俗考

王子今 导读

蓬莱阁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0037205

汉代婚丧礼俗考

杨树达　撰

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代婚丧礼俗考/杨树达撰. 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.12
（蓬莱阁）
ISBN 7-5325-2818-9

Ⅰ.汉… Ⅱ.杨… Ⅲ.①婚姻-风俗习惯-研究-中国-汉代②葬俗-研究-中国-汉代 Ⅳ.K89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3258 号

蓬莱阁丛书
汉代婚丧礼俗考
杨树达 撰
王子今 导读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）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宜兴印刷二厂印刷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5 字数 150,000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-6,000
ISBN 7-5325-2818-9
K·311 定价：10.80 元

2001.1.9
考古书店

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导读

王子今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。学术一脉，不尽薪火相传；学人百世，各有时代风格。如果回顾二十世纪的学术创获，虽经历风雨霜雪，依然满山缤纷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，就是其中水边林下虽并不惹眼，却散发出异常清芬的一簇。

杨树达先生，字遇夫，号积微，湖南长沙人。生于1885年6月1日，卒于1956年2月14日。1897年，杨树达考入时务学堂。1905年，官费赴日本留学，辛亥革命后回国，相继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，湖南第四师范学校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教员。1920年起在北京师范学校、北京法政专门学校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任教。1924年，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国文系主任。1926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、湖南大学教授等职。

杨树达先生著述宏富，多以极高的学术价值，在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其中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（商务印书馆1933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年)一书,作为二十世纪学术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代表作之一,不仅被秦汉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视为必读书,其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,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,也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。

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

"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"孔老夫子以江河运行比喻历史演进的说法,被许多人所接受。历史确实一如江河,有"潮平两岸阔"的缓慢的河段,也有"绝壁天悬,腾波迅急"的峥嵘峡路。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节奏的差别,可以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历史印象和历史感受。青年毛泽东在《〈伦理学原理〉批注》中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感慨:"吾人揽(览)史时,恒赞叹战国之时,刘、项相争之时,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,三国竞争之时,事态百变,人才辈出,令人喜读。至若承平之代,则殊厌弃之。非好乱也,安逸宁静之境,不能长处,非人生之所堪,而变化倏忽,乃人性之所喜也。"毛泽东的认识,固然表现出对历代"乱"和"治"的特殊的个人情感倾向,但是也反映了历史上文化节奏屡有时代变换的事实,反映了"事态百变,人才辈出"的节奏急进的时代往往对于历史文化有较显著的推进的事实。

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是众所周知的乱世,但是以历史节奏分析的眼光看,确实实现了李大钊等人热情呼唤的"少年中国"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也是一个"人才辈出"的时代,当时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艺术等不同领域中,几乎均是青年才士各领风骚。

我们说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"少年"气

China

象，学术创造也是同样。即以集合近代学术大师名著的“蓬莱阁丛书”而论，已经问世的二十余种，最初出版时作者的平均年龄，不过 40 岁左右。杨树达先生也是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，于乱中取静的学术生活中积累学识，发表论著，成就大器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经说，史家的主要职责，是“见盛观衰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，以发现和总结历史的“盛衰大指”(《十二诸侯年表》)。我们如果以较为宏阔的视界看历史文化的全景，那么，“盛”与“衰”，就并不仅仅是指王气的勃兴与凋灭，而且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创造力总和的价值，意味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成就在人类智慧宝库中的比重，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速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进行历史的时代比较，不仅应当看到政治的“盛衰”，也应当对于文化的“盛衰”有所重视。

或以为文章的刚柔，往往可以反映时代的盛衰，如西汉强盛，文章“雄丽而刚劲”；东汉少衰，“文辞亦视昔为弱”；唐代“国威复振”，“终有韩(愈)、吕(才)、刘(禹锡)、柳(宗元)之伦，其语瑰玮，其气奘驵，则与西京相依”(章炳麟：《訄汉微言》)。然而，我们注意到，历史有政治的“盛衰”，又有文化的“盛衰”，政治与文化“盛衰”运动的波形，相互间未必可以完全印合。同意这一看法的朋友或许会接受这样的意见，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为极端的动乱纷争，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看作学术的盛世。当时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活泼的学术空气，在一百年来的学术史中是相当难得的。

回顾中国近代学术史，可以看到杨树达先生以其勤勉的学术实践，为实现当时的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1921 年，杨树达先生完成《说苑新序疏证》。1922 年，中华

China

书局出版了杨树达先生的《老子古义》二卷，这部书 1926 年又再版印行。1924 年，《盐铁论校注》、《汉书补注补正》与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问世。1928 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《词诠》与《中国语法纲要》。《词诠》1954 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《高等国文法》，1931 年出版《马氏文通刊误》及《积微居文录》。1933 年，世界书局出版杨树达先生著《中国修辞学》，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。1934 年，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《论语古义》和《古书句读释例》，北京好望书局出版了杨树达著《古声韵讨论集》。他的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五卷《补遗》一卷，1937 年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部书的六卷增订本，1955 年再次由科学出版社推出。

杨树达先生四十年代面世的论著，有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《春秋大义述》，以及讲义本《论语疏证》、《文字形义学》、《甲骨文蠡测撷要》、《文法学小史》、《训诂学小史》等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国学术经历了特殊的历史变化。而杨树达先生仍然“勤于述作，既速且精，诚令人钦仰赞叹”（周祖谟《致杨树达》）。胡厚宣也曾致书赞叹道：“深觉解放以来，关于甲金小学，惟先生著作最丰，发明最多，其贡献之大，盖突破以往所有之学者。倾仰之至！”中国科学院 1952 年出版了他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，1953 年又出版了他的《淮南子证闻》，他的《积微居甲文说》附《卜辞琐记》亦于 1954 年问世。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《耐林庼甲文说》附《卜辞求义》同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。以《汉书补注补正》为基础完成的《汉书窥管》，1955 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。他的《论语疏证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。1957 年，他的《盐铁论要释》由科学出版社推出。

对于杨树达先生的治学成就，学界评价极高。章太炎先生

China

曾经致书夸赞道:“兄于治学可谓专精。”郭沫若先生亦曾致书言:“我兄于文字学方法体会既深,涉历复博,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,左右逢源,不蔓不枝,恰如其量,至佩至佩!”董作宾先生致书有“深佩卓见”语,谓“公在课程忙迫中犹能作专精研究,贡献古文字学者极大,敬佩之至”。陈寅恪先生致书称:“当今文字训诂之学,公为第一人,此为学术界之公论,非弟阿私之言。幸为神州文化自爱,不胜仰企之至!”于省吾先生致书对于杨著《积微居甲文说》有“义证精确,发挥透彻,并世研契诸公无与抗衡。欣佩之情,匪言可喻”的评价。胡厚宣先生曾经在《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》中发表赞语:“(杨树达先生)写文章最多,不失为五十年来甲骨学研究中最努力的一人。”

陈寅恪先生在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》中,又重复了“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”的赞美之词,并且说:“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,融会贯通,打成一片。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,无不文从字顺,犁然有当于人心。”接着,陈寅恪先生又发表了如下一番感叹:

百年以来,洞庭衡岳之区,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。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,后复游学外国,其同时辈流,颇有遭际世变,以功名显者,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,寂寞勤苦,逾三十年,不少间辍。持短笔,照孤灯,先后著书高数尺,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,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,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。与彼假手功名,因得表见者,肥瘠荣悴,固不相同,而孰难孰易,孰得孰失,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。呜呼!自剖判以来,生民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之祸乱，至今日而极矣。物极必反，自然之理也。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，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，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，以为国老儒宗，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。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，宁复容先生高隐耶？然则白发者，国老之象征，浮名者，亦儒宗所应具，斯诚可喜之兆也。又何叹哉？又何叹哉？

陈寅恪先生所说“青山”“入梦”，“白发”“浮名”，指1942年教育部公布杨树达、陈寅恪等先生为部聘教授，杨树达先生淡然处之，有“只有青山来好梦，可怜白发换浮名”诗句事。陈说揭示“功名”与“文化”之“肥瘠荣悴，固不相同，而孰难孰易，孰得孰失，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”，实在是极富有历史主义眼光的深见。

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撰纪念碑文，有强调学术自立的名言：“……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五十年代初，他在答复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意见时又说：“没有自由思想，没有独立精神，即不能发扬真理，即不能研究学术。”“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，且须以生死力争。”“一切都是小事，惟此是大事。”（陈寅恪：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）陈寅恪先生为杨著所作序文“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”的称誉，亦体现了对于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肯定和坚持。有论者分析说：“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，到（倒）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，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，铮铮有凛然之气。”（陆键东：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》，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，第83页）

China

1951年，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先生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，杨树达先生仍拟将陈寅恪先生的序言置于卷首，陈寅恪先生亦欣然同意。然而1952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致信杨树达先生称：陈寅恪序文的“立场观点有问题”（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45页）。同年11月，杨树达先生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出版，陈寅恪先生的序文果然被删去。1952年12月6日，陈寅恪先生致杨树达先生的信中说到此事：“手示敬悉。大著尚未收到。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，诚为不幸。然拙序语意迂腐，将来恐有累大者，今删去之，亦未始非不幸也。”（《积微居友朋书札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96页）

杨树达先生的《积微居金文说》和陈寅恪先生的序文出版时的遭遇，在他们风云变幻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，但是却能够反映其学术立场和学术品质。两位学者的性格虽有差异，但是就坚持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而言，则意志共同。因而所谓“铮铮有凛然之气”也罢，所谓“立场观点有问题”也罢，正反两种评价，其实是既可以针对陈寅恪先生，也可以针对杨树达先生的，尽管两位先生言行之风格的缓急刚柔确实有所不同。

一生淡于“功名”，“持短笔，照孤灯”，“寂寞勤苦”，“不少间辍”的杨树达先生在《积微翁回忆录自序》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余性不喜谈政治。中年涉世，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，便腐坏堕落，不可挽救；遂畏政治如蛇蝎。由今日观之，人在社会，决不能与政治绝缘。余往时所见，实为错误。至仕途腐烂，亦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，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。昔年在京，往复论学之人有喜谈政治者，而政治上犯大错误之人

China

如陈独秀者，与余虽未谋一面，然以讨论文字学之故，亦曾有书札往还。此等皆属学问上之因缘，与政治绝无关涉也。虑或误解，聊复言之。”(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，第1—2页)虽然检讨了往时之见的“错误”，但是因“虑或误解”所作的解释，仍然使人感到内心与所谓“中年涉世，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，便腐坏堕落，不可挽救；遂畏政治如蛇蝎”有所不同的另一种“畏政治如蛇蝎”的疑惧。

当然，所谓“人在社会，决不能与政治绝缘”，是人生的现实。学者崇尚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也并不意味着逃避社会矛盾，放弃社会责任。以杨树达先生而言，抗战时期“何当被甲持戈去，杀贼归来一卷娱”(1939年12月24日诗)，“却喜健儿能杀贼，故探圣典记攘戎”(《六十述怀》诗)等诗句，都深抒“杀贼”壮志，饱含救亡激情。他在1939年至1940年间开《春秋》课，所著《春秋大义述》一书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，“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，切复仇之志，明义利之辨，知治己之方。”(《春秋大义述自序》)可知抗敌救国之热忱。其说其事，可以看作“故探圣典记攘戎”诗句的注脚。1946年，闻一多先生被暗杀，消息传来，杨树达先生激愤至极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报载闻一多见刺死，今日真乱世也！书生论政，竟不能容，言论自由之谓何哉？”悲恨之声，至今读来令人感动。

汉代婚姻礼俗的总结

杨树达先生以“礼俗”为研究的对象，原意当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，而其中的礼仪制度，自然与通常理解的政制不同，实是一种因“俗”而生，又制约着“俗”，与“俗”始终存在密

China

切关系的"礼"。"礼俗",是社会生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。然而,自五十年代以来,"礼俗",似乎已经退出了社会科学常用语汇。江绍原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的讲义《礼俗迷信之研究》,于八十年代末经整理出版,定名为《中国礼俗迷信》(渤海湾出版公司 1989 年版),于是人们长期感到生疏的"礼俗"一语,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中。

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第一章"婚姻"分七节,即:议婚、婚仪、婚年、重亲、绝婚、改嫁改娶、妾媵。以这样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汉代婚姻史,可以说此前还没有过。而其中论述,又多有可以增益对汉代社会历史之认识的精深之见。

历史研究,重在发现历史的时代特质。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姻史研究新见迭出,例如有关汉代"重亲"现象的分析,就可以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得以深化。

第四节"重亲"写道:"婚姻之家复结婚姻,是为重亲。重亲有二:有姻家复为姻家,婚家复为婚家者。"所举史例有:"《汉书》三十八《齐悼惠王传》云:懿王薨,子厉王次昌嗣,其母曰纪太后。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,欲其家重宠。"此外,"有彼此互为婚姻者"。例如:"《汉书》九十七上《外戚传》云:孝惠张皇后,宣平侯敖女也。敖尚帝姊鲁元公主,有女。惠帝即位,吕太后欲为重亲,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。《汉书》五十五《卫青传》云:青有姊子夫,得幸武帝。又卫青尚帝姊阳信长公主。"这种以婚姻形式强固宗族关系的做法,上至皇室贵戚,下至一般官僚大族,都曾经普遍采用。杨树达先生指出,因重亲之故,而稽其行辈,有不相当者,"或娶上辈之女子",也有"娶下辈之女子者"。

汉世重女权。当时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

China

据较高地位，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迹。《汉书·王吉传》记载，汉宣帝时，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，谈到“汉家列侯尚公主，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”的情形，他认为：“使男事女，夫诎于妇，逆阴阳之位，故多女乱。”将所谓“女乱”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，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。“使男事女，夫诎于妇”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。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关于陈国（今河南淮阳附近）地方风习，就有“妇人尊贵”的记述。与此相关，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，与后世比较，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，宠幸董偃，一时“名称城中，号曰‘董君’”。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。汉武帝大悦，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“主人翁”，相见欢饮，一时“董君贵宠，天下莫不闻”。于是，这种“败男女之化，而乱婚姻之礼，伤王制”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。据说“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，自董偃始”（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）。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“内行不修，近幸河间丁外人”。据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“以列侯尚公主”的制度，“欲为外人求封”，遭到拒绝之后，“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”。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。《汉书·胡建传》则称丁外人为“帝姊盖主私夫”。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，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。

汉家公主不讳私夫，天子安之若素，朝野亦司空见惯，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。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，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寡妇再嫁，是自然而合理的事。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

China

实例，就有薄姬初嫁魏豹，再嫁刘邦；平阳公主初嫁曹时，再嫁卫青；敬武公主初嫁张临，再嫁薛宣；王媪初嫁王更得，再嫁王乃始；许嬿初嫁龙頟思侯，再嫁淳于长；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，再嫁郑翁；臧儿初嫁王仲，再嫁长陵田氏；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，再嫁梁纪等。有关史实，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列入第一章“婚姻”第六节“改嫁改娶”中。杨树达先生总结说：“夫死，妇往往改嫁。”“虽有子女亦然。”“且有携其子女往改嫁之家者。”

汉光武帝时，帝姊湖阳公主新寡，刘秀与共论群臣，有心微察其意向。公主说：“宋公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”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。刘秀愿意谋求撮合。据《后汉书·宋弘传》，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，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，又对宋弘说：“谚言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？”宋弘则答道：“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刘秀于是对公主说：“事不谐矣。”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，其事最终“不谐”，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，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。

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，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褚少孙补述：“是时平阳主寡居，当用列侯尚主。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，皆言大将军可。”公主笑道：此人出自我家，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，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？“左右侍御者曰：‘今大将军姊为皇后，三子为侯，富贵振动天下，主何以易之乎？’于是主乃许之。言之皇后，令白之武帝，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。”可以看到，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，非常大方地与“左右侍御者”公开讨论，“主笑曰”云云，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。而从公主一方同意，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，

China

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。且先"言之皇后",后"令白之武帝"的程序,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
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,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五次守寡。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说:"户牖富人有张负,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,人莫敢娶。(陈)平欲得之。"城中有人办丧事,陈平"侍丧",尽心竭力。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,又随陈平至其家,看到家虽穷弊,然而"门外多有长者车辙"。张负对其子张仲曰: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。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,一县中尽笑其所为,表示疑虑。张负坚持道: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会长久贫贱呢?决意成就这一婚姻。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:"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,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姓张。"他又分析了"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",指出:"这个故事,有好几点值得注意。第一,嫁过五次的女子,不厌再嫁。第二,寡妇的尊长,不但不劝寡妇守节,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。第三,嫁过几次的女子,也有男子喜欢她,要娶她。第四,寡妇的父亲,并不以女儿为寡妇,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。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。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,并非降低标准,乃是他有知人之明,看清陈平虽然贫困,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。"(吴景超:《西汉寡妇再嫁之俗》,《清华周刊》第37卷第9、10期合刊)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于"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,人莫敢娶"语后写道:"按即《左传》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'是不祥人也!'""'人莫敢娶',是因为有"克夫"的嫌疑(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第1册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302页,第9页),并非嫌弃她是"嫁过几次的女子"。

China

杨树达先生总结汉代“夫死，妇往往改嫁”等现象时，所举除陈平妻、湖阳公主等故事之外，还有敬武长公主、宣帝外祖母王媪、孝元傅昭仪母，以及扬雄《答刘歆书》说到的临邛林间翁孺妇等例。

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、不失体面的风习，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：“揭开《三国志》的妃后列传，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、蜀、吴的第一个皇帝，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。”（董家遵：《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》，卞恩才整理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258 页）

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，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。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。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说，朱买臣家贫，卖柴为生，常担柴道中，诵书歌讴，“妻羞之，求去”，“买臣不能留，即听去”。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，见朱买臣依然饥寒，还曾经“呼饭炊之”。李白有《妾薄命》诗：“雨落不上天，覆水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”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，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《渔樵记》、清传奇《烂柯山》、京剧《马前泼水》等。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，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。汉代已经有“覆水难收”的说法，见于《后汉书·何进传》，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。“马前泼水”的衍化，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真正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。我们所注意的，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。女方“求去”，男方“不能留，即听去”，前者要求离异，后者未能挽回，于是勉强应允。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，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，是不多见的。

班固在《白虎通·嫁娶》中曾经强调：“妻，齐也，与夫齐体。”陈登原先生《国史旧闻》卷二八指出，汉代人虽然已经有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